

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逻辑理路、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代悦 胡艳琳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识性范畴,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建设中意识上的自觉,立场上的自主和发展上的自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提升是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于“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系统工程。始终遵循“历史—理论—实践—价值”四位一体的提升逻辑理路:以中华文化内核的坚守与传承夯实其历史根基;以“两个结合”为核心的理论逻辑从方法论层面提供全新理论范式;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场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逻辑彰显其文化自信;以凝聚共识,为推动文化强国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价值范式。通过价值、理论、实践层面,系统考察当前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所面临的数字技术革命下文化价值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诉求困境、西方话语霸权下主体性的消解等核心挑战,提出面向新征程,进一步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确保文化主体性提升的政治保障,坚持文化的守正创新是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动力源泉,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构建中国特色话语叙事体系是彰显文化主体性价值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华文化主体性;逻辑理路;现实困境;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6-0016-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602

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逐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设,塑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文化主体性质界定、发展条件、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阐释成果来看,邹广文从哲学角度辨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沈壮海指出,精神、能力和行动的高度自觉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2]。韩庆祥则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指向就是高扬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3]。叶本乾立足“两个结合”,论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自觉—自立—自主—自信”的生成逻辑^[4]。韩震进一步阐释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世界意义在于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文化提供有益参照^[5]。从实践进路成果来看,田鹏颖从唯物史观的视野探讨了发展文化主体性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战略布局^[6]。孙来斌提出增强引领力、增进文化认同、提升创造力和辐射力四个着力点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7]。元光则着眼于文

收稿日期:2025-10-12

作者简介:代悦,女,法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百年党史学习教育引领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研究”(21SKDJ008);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大学生廉洁自律养成的思政文化浸润路径研究”(K25YG2050191)。

化主体性的问题指向,提出保守思维定式、复杂现实制约与潜在社会风险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8]。宇文利则进一步指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扎根和扩大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9]。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文化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文化主体性的内生性省思,从哲学视角和历史演变进行概念解读和内涵阐释,而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尤其是全球化与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对提升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困境分析和实践进路构建相对薄弱,未能充分揭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内在一致性。这往往导致三个层面的认知缺口:一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动态调适和发展机制的理据尚未厘清;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过程缺乏系统性把握;三是解决现实困境的实践路径缺乏学理支撑。由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场域,将文化主体性的当代提升视为一种在“历史—理论—实践—价值”中的动态调适与创新性发展过程,坚持历史性和时代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研究遵循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何以可能、因何提升、如何提升的逻辑思路,从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层面系统考察其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试图回答:中华文化主体性如何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实现整体性跃升?如何通过政治引领、文化创新、话语重构协同推进,将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理论逻辑优势转化为实践动能?最终为实现文化强国提供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效能的方案。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概念界说

“主体性”这一源自西方哲学的范畴,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中,经历了深刻的本土化重构。主体性原指人作为一定认识和实践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所具有的特性^{[10]56},是在主体“自主意识”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黑格尔提出“现代世界的轴心是精神的主体性”^{[11]417},这容易陷入抽象的本质主义,将主体性视为某种超历史的永恒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其深刻的历史性、实践性与辩证性完成了对主体性认识的变革,为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本质内涵及特征提供了应然的理论视角。

(一) 文化主体性

从唯物史观来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对客体进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属性和特征。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自主辨识和理性认同的观念意识,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和呈现,并在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得以反复确证。正如马克思所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意识的类存在物。”^{[12]163} 理解文化主体性范畴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历史生成性维度。文化主体性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是以前人创造的物质基础为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13]172} 文化主体性是一种历史积淀的赓续,需要从“社会生活物质方面”去真正理解其形成和发展^[14]。二是实践创造性维度。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在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动性和自为性。人类实践活动不仅要实现物质生活条件的“自为”,还要实现思想观念、意义价值、精神力量等文化追求的“自为”。三是关系规定性维度。文化是对人们实践活动中发生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现实反映^{[12]523},而文化主体性就在这些“关系”的把握和处置中得以体现。因此,关系规定中的文化主体性具体表现为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文化交往中的自主建构以及在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张力中定位自身。

(二) 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及表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指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与党领导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的自主性、自觉性和创造性意识,体现为文化认同的建构、文化价值的坚守、文化形态的创新以及文化话语的自主表达。这一内涵

既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化,又突出对革命文化的精神淬炼与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还涵盖对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创新与主体自觉。尽管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有机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建构,面对不同时代课题时必然产生内部调整与对话。这种张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下,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断被扬弃、调和与超越,最终转化为文化创新发展的强大内驱力,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既不泥古,也不西化,而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地走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就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9}。这不仅是对文化功能的阐释,更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物质的高度概括。回望历史,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五千年文明根基为依托,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的不断变革中实现自我确证。其对外表现为先进文化的示范作用,对内表现为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精神动力^[15],以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标志始终给予国家和社会凝聚感和感召力^{[16]24},激发人民群众在新征程上团结奋进。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通过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保持中华文化生命力历久弥新^[17],以开放包容姿态吸纳外来优秀成果,最终确立中国文化价值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定义权与话语权,构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明新形态^[18],引领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不是靠穷兵黩武,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19]119}

二、“历史—理论—实践—价值”四位一体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逻辑

文化是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思想及其物质制品^{[20]139},其主体性根植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中,并在社会矛盾运动中不断生成与发展。在当前全球化和现代化交织的背景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升必须顺应时代背景,超越抽象的思辨,遵循“历史—理论—实践—价值”四位一体的辩证逻辑过程。这四大逻辑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闭环系统,形成了一个从“哪里来”到“用什么指引”,再到“如何做”,最后“为了何种目的”的完整逻辑链条。正是在这种动态的、辩证的互动关系中,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才得以不断地被唤醒、锻造、检验和升华。

(一) 历史逻辑:中华文化内核的坚守与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1]中华文明经历上下五千年的洗礼,内蕴丰富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思想观念。革命文化承前启后,以理想信念与牺牲奋斗铸就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解放的精神丰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时代前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凝聚了引领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些文化内核并非被静态保存,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被重新激活为应对现代性挑战的重要资源。进而实现从“传统延续”向“未来开启”的辩证跃升,最终推动文化主体性的提升。

第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升深植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1]5}中华文明绵延赓续正是为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一方面,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充分印证。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汉唐的开放包容,从宋明理学的体系建构到近现代的救亡图存,每一次文明演进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深刻印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根本依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史观,中华文明连续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上,更表现为价值观念、制度文明和精神追求的内在统一。五千余年积淀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谱系和价值坐标,为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升提供了深厚历史根基。

第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升是对文化内核的传承与发展。这并非简单复刻文化符号,而是对核心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兴亡有

责”的家国情怀等构成了文化基因内核。这些内核要素既非静态的文化标本,也非简单的复古对象,需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转化为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标识。

(二) 理论逻辑:把握“两个结合”筑牢方法论指导

“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22]23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人类文明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命题。把握“两个结合”是提升文化主体性的方法论指导,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互动,构建具有解释力与引领力的理论范式。

其一,“第一个结合”夯实了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根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触发了一场深层次的主体性重建。两者的结合是伟大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使中华文化主体性摆脱了依附、模仿或被动回应的困境,转而坚定了立足自身历史传统与实践的自信。新征程上,进一步促进两者的结合要立足于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抽象理论实践化、具象化,不断提炼中国智慧和中國经验,逐渐转化为适应时代境遇的方法指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

其二,“第二个结合”激活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命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经由两者深层次的价值互鉴与契合^[23],推动着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从“外在关联”转向“深层互构”。这是党的科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渗透、彼此成就,实现文化主体的重构与文化生命体的现代再造的实践过程。该生命体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现实根基,并以世界文明精华为有益补充,形成“四位一体”的有机结构。这一创新理论推动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实践有机融合,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三) 实践逻辑:“双创”方针指引下的转化与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2]320} 这一论断表明,思想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具有实践能力的主体。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升,也必然依托于文化主体的实践创新。“双创”方针本质上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文化生产力的转型。

从创造性转化上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内涵提炼、形式再造与现代表达,将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基因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4],重新融入国家治理与社会规范,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在转化过程中,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同时,文化的转化需要确保文化主体性在开放包容中保持独立品格,在国际文化交往中彰显中国智慧。从创新发展上看,文化主体性的提升是文化发展中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革的能动反映,也是人民群众在文化生产关系变革中实现主体地位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将文化创新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市场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等手段,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从而增强文化生产的自主性。从这一实践逻辑出发,文化主体性提升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又为破解文化发展中的现实矛盾提供方向指引。

(四) 价值逻辑:为现代化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价值范式

文化主体性既是现代化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力量。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现代化建设蕴含着生产力解放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必然要求文化体系的同步革新。这种革新本质上是通过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价值范式。这一范式不仅超越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效仿和依赖,更是在价值观上提供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彰显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文明

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扎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伟大实践,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积极互动的内生性现代化过程。在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等内容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倡导一种超越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致力于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共生文明格局。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核动力,也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可借鉴的范式选择。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文化是“现实的人”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存在^[25]¹⁶,其主体性的提升必然与特定时代物质生产方式之间存在辩证互动有关。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进程中文化价值的异化风险、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诉求的双重困境,以及西方话语霸权下文化主体性消解等困境,进一步加剧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复杂性。为应对这些现实挑战,必须坚持以历史为根基、以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基础、以价值为导向的逻辑脉络,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张力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最终实现新征程上文化主体性的整体跃升。

(一) 数字技术革命下文化价值的异化

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文化的价值生成机制发生了转变。技术的工具理性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互耦合,文化生产逐渐偏离其社会性本质,导致文化价值发生“异化”,从深层次制约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升。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在技术理性和资本逻辑下文化本真性的消解和价值导向的扭曲。

其一,文化价值的本真性缺失。算法推荐系统主导下,文化内容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日益偏离文化自身的价值,转而服从于流量导向、用户偏好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原则。通过个性化推送、排序精选等算法,形成了“流量为王”的文化分发逻辑,致使基于文化价值的产品趋于即时满足、感官刺激和情绪化。例如,在数字资本运行逻辑下,日本输出的文化产品常聚焦于特定的审美和亚文化,而更深层的传统哲学、伦理价值在全球叙事中反而被边缘化,出现了技术载体与文化价值的脱节。在这一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华文化价值也出现了工具化和空洞化倾向,严重削弱了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根基,影响着文化主体性的提升。

其二,文化价值导向的扭曲。资本逻辑借助技术手段的强势扩张^[26],对文化主体性构成严峻挑战。资本驱动的平台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可量化的流量资源,使文化价值判断过度依赖市场反馈机制,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被弱化。数字技术赋权下的文化再生产呈现出异化风险^[27],特别是虚拟社区中内容的泛娱乐化、低俗化,使文化价值判断陷入相对主义困境,扭曲主流文化价值导向。在数字空间中文化表达虽获得新场域,但该空间内的亚文化群体通过戏谑解构、符号拼贴等方式消解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性,使文化再生产过程出现价值扭曲。这种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失衡,即文化创造主体从人民主体异化为数据终端,价值评判标准从社会性需求异化为商业性指标。

(二)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诉求的双重困境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³²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系统性跃迁,更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型与重构。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双重困境:文化供给结构性失衡和人民主体力量发挥不足,难以有效激发文化主体的内在动能。

第一,文化供给结构性失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中,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人民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追求。其内在规定表现为“精神富有”,这种“精神富有”依赖于文化产品内蕴的文化价值。但在资本逻辑的影响下,文化产品的供给带有极强逐利色彩,未能满足民众的精神文明需求,这严重削弱了中华文化的现代活力。此外,部分生产者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生产的文化产品往往呈现出过度商业化与短视化倾向。文化供给的参差不齐与人民的

高品质文化诉求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中华文化在当代表达中出现断层,其内生动力未充分激发,严重阻碍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建设。

第二,人民主体力量发挥不足。人民不仅是文化发展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发展过程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28]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是文化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动力。但在当前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人民的主体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激发,其文化首创精神仍面临制约。这一主体性力量的缺位,使得文化发展难以真正扎根于人民的实践沃土,动摇了文化繁荣与自信的根基,从深层上阻碍了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

(三) 西方话语霸权下文化主体性的消解

全球化浪潮下,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动态博弈。西方凭借历史形成的霸权地位构建起非对称话语格局,不断侵蚀着非西方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也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在话语体系上深受外来学术资源影响,容易陷入主体性消解危机。

一是西方话语霸权制约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认同。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29]³²,即任何话语都是权力的产物。所谓话语霸权就是少数西方国家凭借其历史形成的现代化与全球先发优势,长期掌控了国际社会的话语资源,导致某些国家和地区处于一种失语的被动状态。例如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被迫接受系统性的“真理生产”,其文化主体性意识持续性消解。这种西方话语的强势渗透和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压了中华文化自我表达与自我建构的空间,削弱了以中华文化价值为根基的中国话语表达和国际传播,不利于文化自信的建立与文化主体性的全面提升。

二是本土话语体系的原创性建构不足削弱了话语自信。本土话语体系的建设离不开自主知识体系的强力支撑。而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系统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正是我国话语体系建设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学术分析框架与学术表述上仍存在依赖外来学术资源的情况。深入剖析话语体系构建过程,可以发现学术自主、话语自立与文化主体性提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近代以来,中国学术长期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学徒状态”,理论框架多沿用西方模式。这种依赖制约了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实践开展原创性知识生产,阻碍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信与话语自信的形成。

四、从政治引领到话语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实践进路

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实践进路,是遵循其内在逻辑理路并回应时代困境的创新性探索。要以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政治保证;以文化创新激活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生动力,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彰显文化主体性的现代表达方式,最终实现中华文化引领力、创新力与辐射力的整体性跃升,彰显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图景中更加鲜明坚实的主体地位。

(一) 政治引领:强化党在文化领域的坚实领导权

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3]¹⁷⁸ 这表明思想文化的阶级性,政党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特征^[20]¹⁰⁸,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31]。在面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环境下,通过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凝聚文化共识,激发文化主体力量,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掌握数字空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牢牢掌握现实空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了思想领域的根本遵循,更在实践中强化了对各类阵地的管理与引导。面对数字技术革命下文化价值的异化风险,党的文化领导权就不应局限于对现实空间场域中文化发展的领导,还应转向数字空间场域中文化建设的引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对此应加强对数字空间的文化领导,优化党的权力

运行效能。首先,建立健全数字空间文化活动的法律规范制度。通过制定和推行数字空间管理法规,明确文化活动规范,为数字文化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营造健康有序的文化发展环境。其次,加强对数字空间文化活动的监管。静态层面以规章制度规范数字空间的文化秩序,在动态层面理应配备相适应的监管机制,采取实时监控、瞬时溯源、及时阻断的策略,营造良好文化传播环境。最后,优化对数字空间的文化资源配置。党的文化领导权包含对文化资源的整合权^[32],表现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统筹权威。党在数字空间的文化资源配置,要注重挖掘彰显中华文明特色的文化数字产品,同时兼顾数字主体喜好,输出具有共情力的文化素材。

2. 巩固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33]³³²。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断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提升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必须体现人民性^[34],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性,要始终践行人民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主体,是文化发展的坚实群众基础。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搭建多样化文化共享平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使人民成为文化的建设者。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基层党组织要提供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切实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这也是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体现。

(二) 文化创新:推进文化主体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赓续与彰显在于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它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体现为“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既要在文化基因的赓续上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又要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中推动实践创新发展,使中华文化在回应时代挑战、满足人民需求中焕发蓬勃生机,为文化主体性提升注入强劲有力的发展动能。

1. 在“两个结合”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

“两个结合”深刻阐释了理论创新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35],彰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创新范式。“第一个结合”确立了文化理论创新的实践根基,确保了文化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大地;“第二个结合”拓宽了文化理论创新的历史纵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36]²¹⁹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37],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又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智慧滋养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就要通过范畴再造、方法论融合、价值重塑等方式,催生具有新时代特质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世界历史的思想,也汲取了中华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智慧,成为创新理论的典型成果。

2. 推动文化与科学技术创新融合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8]²⁷⁴科技进步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文化供给的期待,实现人民精神上的富裕。借助科技对文化的技术支撑,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

一方面是推进文化领域的技术性突破。聚焦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基础,攻克文化创作、生产制造、传播流通等全产业链环节的关键技术,推动 AR/XR、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创新运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凭借数字技术推动文化符号的创新性发展,超越“数字搬家”式的表层移植,克服价值扁平化、叙事失语、主体性消解等内部困境。例如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创立“古陶瓷基因库”,将非遗文化转化为可释读的数字化展品,以现代科技激活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是推动文化产业形态创新发展。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

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3]151}人在物质生产中将自身的意识烙印于物质产品上。为满足人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新需求,必须依托科技赋能文化创新,比如北京的“数字中轴”项目实现从单一业态到跨领域的深度融合,开发中轴线主题数字藏品、AR 导览等产品,推动文化从“静态存量”转化为“动态流量”,将中华美学文化和当代价值追求融入文化产品之中,在融合应用中突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强化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

(三) 话语重构:塑造彰显文化主体性的现代表达体系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西方“话语陷阱”不断显现,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十分激烈。为突破既有西方话语框架的束缚,亟需以中华文化为根基,重构中国现代话语体系,通过国际传播充分展现中华文化当代活力,使其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有力地发出“中国声音”。

1. 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下,话语体系构建要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扎实的理论知识为支撑。为充分展现自信自强的中国气派,需通过系统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话语体系奠定学理基础。西方话语体系是西方社会自我认知的载体,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则要彰显出中华文化自信。一方面推动中国本土固有知识体系的现代转化。“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22]367}其中“以文化人”“修齐治平”“选贤任能”等思想具有社会科学价值,将成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来源。转化的关键在于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的语言和规范把这些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呈现出来、阐释清楚。比如“贤能政治”概念的提出,就把中国历史上“选贤任能”治理智慧,通过政治学理论的淬炼,转化为可与“选举民主”对话的现代学术范畴。另一方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中国伟大实践经验为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厚土壤。要进一步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化,应从三个维度入手。在微观上深入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经验;在中观上聚焦特定领域的创新性实践经验,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特色的理论成果;在宏观上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唯有扎根中国文化本体和中国实践,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39],才能打破被定型化的认知框架,避免陷入西方现代化的“普遍主义”陷阱^[40],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解释力与传播效能。

2. 建设中国特色话语的国际传播新局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有意识地融入中国故事和中华文化元素,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强化其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地位,实现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的跨越。国际传播不仅传递国家形象与政策信息,还应着眼于构建全球叙事,通过引发情感共鸣,形成更广泛的文化认同。一方面推动文化产品的多样传播。鼓励影视、文学、数字产品等以多语种、本土化方式“走出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共情传播。例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黑神话:悟空》《长安三万里》等作品频频“出圈”,就是依托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产品“出海”^[41]。优秀文化作品是表达文化自信的载体^{[42]113}。又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以中英文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即是以现代话语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华文明深刻价值的文化实践。通过文化“走出去”,持续提升海外市场文化感召力,以文化传播展现中华文化自信,破除“文明只属于西方”的“话语陷阱”^{[43]78}。另一方面,通过叙事讲好生动的中国故事^[44]。依托“一带一路”等多边共建平台,积极分享中国在全球文明对话、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治理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提供崭新的实践路径^[45]。通过这些开放、共享、包容的平台传播中国故事,展现出我国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借鉴,持续提升我国的国际感召力、话语软实力和文明影响力。

五、结语

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系统探讨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逻辑进路,提出“两个结合”作为

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方法论指导,强调党对文化领域的坚实领导,推动中华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创新中国话语叙事策略等实践进路。本研究也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本文所提出的实践进路尚需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与完善。特别是对于“两个结合”等方法论如何在具体文化领域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具体行动方案,还缺乏微观层面的机制性剖析与实证支撑。下一步研究将聚焦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治理,构建一套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可理解性的话语效能评估指标体系,来验证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的实际效果,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2] 沈壮海. 习近平的“中华文明观”论要[J]. 党的文献,2024(3):3-13.
- [3] 韩庆祥. 论文化和文明的相对区别及其重大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2):1-14.
- [4] 叶本乾.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多维度彰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5):44-53.
- [5] 韩震.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4):36-41.
- [6] 田鹏颖. 建设文化主体性的真谛在于创造新的历史[J]. 哲学分析,2024(3):146-151.
- [7] 孙来斌. 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四个着力点[J]. 理论视野,2025(3):46-52.
- [8] 元光,张萌.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概念的理性溯源——基于概念演变的视角[J]. 社会科学研究,2024(6):1-10.
- [9] 宇文利. 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巩固[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0):28-36.
- [10] 高清海. 哲学于主体自我意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 马克思恩格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肖祥.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文化主体性塑造[J]. 理论学刊,2025(2):139-149.
- [15] 沈江平,丁耀鹏.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40-49.
- [16] 谢弗(Schafer, D. P.). 文化引导未来. [M]. 许春山,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7] 张瑜.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文化逻辑、理路遵循、践行方式[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7-34.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20]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李步楼,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1]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求是,2024(8):4-11.
- [2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3] 邹广文,白宁远. “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三重逻辑[J]. 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3):15-22.
- [24] 何毅,祝建华. 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的三重理路论析[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273-285.
- [25]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6] 邓佳. 数字文明主体性的理论审视[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10):134-144.
- [27] 孟睿. 《资本论》的文化维度分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3):80-88.
- [28]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2020(10):4-13.
- [29]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30] 芦思姮. 全球治理变革中的话语权博弈:西方霸权叙事投射、拉美本土抵抗及其启示[J]. 世界社会科学,2025(5):74-92.
- [31] 靳帅帅.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6):47-56.
- [32] 蔡文成,刘富东.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2024(11):63-70.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34] 王永友,骆丹.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当代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24(1):63-74.
- [35] 孟东方,翟长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困境挑战与实践进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0-19.
- [3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7] 于安龙.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基本维度、内在构成与壮大路向[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27-40.
-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9] 胡承波,杨月乔.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J].重庆社会科学,2024(2):41-54.
- [40] 张浚.西方科学普世主义陷阱的历史与现实[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20):92-99.
- [41] 王莹.文化IP的当代塑形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2):69-79.
- [42] 沈壮海.论文化自信[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 [43] 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
- [44] 李君如.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的构建[J].理论视野,2024(1):38-42.
- [45] 刘衍峰.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机制创新与实践理路——基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案例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2):122-134.

The Logical Path,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Dai Yue Hu Yanlin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 signature concept of 21st-century Marxism, reflecting a nation's and its people's conscious awarenes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utonomous stance, and confidence in development. The contemporary enhance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med with historical initiative, grounds itself in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actice of "renewing an ancient n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follows a quadripartite logical framework of "history-theory-practice-value": the historical logic reveal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theoretical logic, centered on the "two integrations," consolida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enhancement; the practical logic, manifested throug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sphe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vides a solid practical foundation; and the value logic focuses on building consensus and offering a value paradig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By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core challenges—such as the alien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in the digital technology revolution, dilemmas of cultural demand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under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This study proposes pathways for the new journe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as a political guarantee, adhering to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ile breaking new ground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advanc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narrativ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essential route to manifest the value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logical approach; practical challenge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责任编辑:左福生]